

評介宮崎聖子著《植民地期台湾における青年団と地域の変容》

陳文松*



書名：植民地期台湾における青年団と地域の変容
作者：宮崎聖子
出版社：東京，御茶の水書房
出版時間：2008年3月
頁數：xv、494頁

在戰後迄今有關日治時期臺灣青年教化團體的研究中，宮崎聖子這本書《植民地期台湾における青年団と地域の変容》（殖民地時期臺灣的青年團與地域變遷）可說是最完整的作品。¹ 本書除了將青年團視為社會教化與軍事動員機構，而延續臺灣學者王世慶與日本學者多仁照廣、近藤正己歷年來對於青年團體的既有研究成果之外，² 同時將青年團放置於殖民政策與地域社會之間，從青年團本身的質變來呈現殖民政府與街庄地方領導階層的變遷。換言之，作者的企圖除了要透過青年團的演變來釐清半世紀殖民統治時期臺灣的青年團政策外，更將青年團作為研究的主體，從中觀察臺灣人地方領導階層在街庄層級（作者對於街庄之定義主要延續蔡慧玉之相關議論）³ 所扮演之角色。因此，本書也可視為日治時期青年世代與臺灣地方街庄社會領導階層變遷的關係史研究。

*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來稿日期：2010年4月20日；通過刊登：2010年6月4日。

¹ 宮崎聖子，《植民地期台湾における青年団と地域の変容》（東京：御茶の水書房，2008）。

² 王世慶，〈皇民化運動前的臺灣社會生活改善運動：以海山地區為例（1914-1937）〉，《思與言》29: 4（1991年12月），頁5-63；多仁照廣，《青年の世紀》（東京：同成社，2003）；近藤正己，《総力戦と台湾：日本植民地崩壊の研究》（東京：刀水書房，1996）。

³ 蔡慧玉，〈日治臺灣街庄行政（1920-1945）的編制與運作：街庄行政相關名詞之探討〉，《臺灣史研究》3: 2（1996年12月），頁92-140。

戰前青年世代與臺灣近代社會發展的研究課題，不但在過去，近年來更成為臺灣史研究中的熱門課題。自 1980 年代以來，若林正文開始探討抗日運動中的運動主體問題而提出「本地地主資產階級」與「新興知識分子」之說，⁴ 吳文星在其《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中針對政權更迭之際「新、舊」社會領導階層之變化，透過新式教育所引發的社會流動來進行領導階層變動之分析；⁵ 而周婉窈則以西方歷史學者布洛克（Marc Bloch）對「歷史世代」之討論，先後提出「遺民世代」、「乙未戰後新生代」和「戰爭期世代」的分類；⁶ 以及 2008 年社會學者蕭阿勤分析臺灣戰後世代所提出的「軸心世代（回歸現實世代）」。⁷ 不僅在史學界，臺灣文學研究領域當中傳統文人對於「新／舊」或「傳統／現代」的議論方興未艾，而不同世代間如何因應時代之變動，除了上述二元對立的論述外，進而有所謂「衍生世代」一詞的問世。⁸ 然不管是世代論或階層論的議論，除蕭阿勤屬戰後史研究之外，都企圖打破以往臺灣近代史中早期以「統治－抵抗」二元對立論述的模式。而且即便是針對此一模式，亦冀求能更深化「統治」或「抵抗」內涵的多義性與多元樣貌。

不過，在注目於臺灣社會中歷史世代抑或文化世代之際，往往著重在世代間的延續與時代的相互折射（投射）所顯出的身影，而無法兼顧或甚至忽略殖民政府（統治者）設計的制度或政策對於殖民地社會（空間）與世代之間關係的形塑或扭曲。而本書的最大特色之一，便在於能同時兼顧兩者，以青年團政策史或制度史之角度為軸，來探討青年團體所扮演之角色及其與政策遞嬗間的相互關係，最後檢視其對臺灣社會之影響。

本書乃是由作者的博士論文〈植民地期台湾における青年団の研究（1910-1945）〉（殖民地時期臺灣的青年團研究〔1910-1945〕）改寫而成，⁹ 其章節安排

⁴ 若林正文，《台湾抗日運動史研究・增補版》（東京：研文出版，2001）。

⁵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正中書局，1992）。

⁶ 周婉窈，《海行兮的時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

⁷ 蕭阿勤，《回歸現實：臺灣一九七〇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08）。

⁸ 柳書琴，〈傳統文人及其衍生世代：臺灣漢文通俗文藝的發展與延異（1930-1941）〉，《臺灣史研究》14: 2（2007年6月），頁41-88。

⁹ 宮崎聖子，〈植民地期台湾における青年団の研究（1910-1945）〉（東京：お茶の水大学人間文化研究科博士論文，2004）。

係按照時代先後具體呈現作者的論述過程，各章的標題依序為：「地方指導者之教化（1910年代）」、「官製青年團與抗日青年團體的抗爭（1920年代）」、「臺灣總督府對青年團之統制與『篤農家』的養成（1930-1935）」、「臺灣人地方指導者的政治退場與『海外工作』尖兵的養成（1935-1938）」、「團員的中下階層化與日本人對青年團的掌控（1939-1942）」及「青年團由皇民奉公會接管與青年的管理機關化（1943-1945）」等六章分別論述六個不同時期，以及序論與結論。本書融合了人類學、歷史學、政治學和社會學等跨領域的研究視野，讓枯燥難讀的政策史專書變得興味十足，尤其在每章的後半段，都放入作者近十年來在臺灣各地（以日治時期新莊街，即今日新莊市與泰山鄉為主要調查範圍）所進行的口述訪談紀錄，可以讓讀者直接了解殖民政府的青年團政策如何在臺灣地方社會（街庄）落實和運作的情形。簡言之，在書中作者以青年團作為研究調查之主體，透過殖民政府青年團政策史之變遷來探討日本殖民統治臺灣半世紀當中，繼學校教育體系與地方行政體系完成之後，進一步描繪出臺灣軍事動員體系如何從無到有的政策決定與變遷過程，而青年團體的質變正反映出這樣的歷史過程。

作者在結論中指出，1910年代之初，青年團原本只是附屬於各地方街庄教化團體中的一個附屬機構，但從1920年代起至1945年日本殖民統治結束為止，依照不同時期先後扮演著不同階段的角色，到後期更成為軍事動員與士兵（充任軍夫為主）培訓機構。而其會員的組成也從培育街庄內下一代地方指導者的青年「特權」組織，轉變成戰爭動員時期以士兵培訓為主且有一定年齡限制的義務性教化機構。尤其自1930年代後半至1945年之間，青年教化團體隨著戰局之震盪而不斷地衍生出不同任務編制的青年教育（教化）機構與軍事動員團體，前者如青年學校、實業補習教育，後者如勤行報國青年隊、青年特別鍊成所等，而讓青年團特有的功能逐漸被分化，最後終於在日本敗戰前夕與青年學校等分別被編入學徒隊、國民義勇隊等軍事動員機構而走上消失的命運。

作者同時透過地方社會中的青年團組織之運作，進一步透視臺灣社會中青年團體和抗日運動團體的相互關係、下一代地方領導階層的養成、青年團當中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間的族群對立，以及地方社會領導者與地方街庄的權力關係運作中青年團所扮演的角色。藉此，作者特別強調因該政策之影響而造成被統治者——

臺灣社會的分化與斷裂（分斷）。這種社會的分斷不僅影響層面廣泛，時而階級（出身背景），時而學歷，時而世代（年齡），甚至包括語言，而且還延續到戰後。

因此，總的來說，本書就青年團體以及地方領導階層的研究上，如上所述，不但言有所本，亦有所突破前人未達之域，特別對於戰爭動員時期青年團體的遞嬗與相互關係的釐清，更值得大讚一詞。不過，筆者仍有以下幾點就教於作者，以供日後進一步論述之參考。

首先，從青年團政策之探討，作者明確指出殖民政府對「青年」的掌握，透過青年團這樣的教化團體，在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變化。然而在此同時，作者對於「青年」的定義，究竟為何？書中雖有說明卻未充分釐清。例如針對 1920 年代抗日運動中《臺灣青年》雜誌頻繁出現的「青年」用語，作者指出這是抗日運動團體為了構築自身的主體性而沿用日本內地普遍使用的語彙，以「青年」自我標榜而相對於依附在殖民體制內的臺灣人，後者被稱為「老人」或「御用紳士」。但在此之前，「青年」一詞並不常用。¹⁰ 同時，作者亦指出抗日的青年團體與官製青年團體最大的差異在於抗日青年會等青年團體沒有年齡上的限制，參與其中的青年多屬高學歷，尤其不乏留學生；相對的，官製青年團體則以公學校畢業生為主，還有年齡上的限制。前者自主性高，後者則由地方街庄長或學校長指揮因而自主性低。

因此，日治中期光是 1920 年代便明顯存在著兩種不同類型的「青年」範疇，其一為「官製青年團青年」，另一為抗日青年團體的「臺灣青年」。此兩者於 1920 年代因著對殖民統治與「國族」認同的分化對立（分斷）而震驚殖民政府，令當局痛感青年思想教化之重要性，遂有 1926 年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的設立與 1930 年臺灣青年團訓令的頒布，以強化對青年層之社會教化與思想統制。

但在此之前，上述兩者不同類型的青年團體中所謂「青年」的概念及其內涵如何被引進臺灣以及如何為臺灣社會所接受，並於 1920 年代成為分化對立之各方競相使用，作者卻未加以深究。¹¹ 誠如作者所指出，〈青年的問題〉在 1903 年便已出現報章雜誌，這是一篇日本人公學校教師呼籲當局增設學校以廣納未就學

¹⁰ 宮崎聖子，《植民地期台湾における青年団と地域の変容》（東京：御茶の水書房，2008），頁 79。

¹¹ 作者僅在《植民地期台湾における青年団と地域の変容》頁 120 註 27 提及日本內地的「青年」概念的研究成果。

臺灣人子弟的文章。換言之，殖民地的學校教育展開沒多久便無法滿足臺灣人子弟就學的需求。而日後青年會或青年團的出現，不論日本內地或臺灣，乃是作為一種社會教育（教化）團體以輔助學校教育的不足而設置。因此，對於所謂「青年」概念的引進和定義，並非如作者所言一直到 1920 年代才為抗日運動團體所大量使用，而是殖民政府一開始欲積極將殖民統治與現代新式文明相互連結之際，殖民地教育、教化政策當中的一個關鍵詞。

當時被賦予這項使命的，便是日本領臺後不久於 1896 年設立的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至於何以是國語學校，以及「青年」概念如何被引進臺灣社會之過程，由於篇幅所限無法深論，但透過國語學校機關刊物《校友會雜誌》（1899 年 2 月創刊）內容分析可知，殖民政府乃欲將該校學生培養成日本「新領土經營者」的現代「青年」，以擔任推動新式教育之普及與臺灣社會教化紮根工作的先鋒部隊。¹² 國語學校與其在 1919 年改制為師範學校後之屬性殊為不同，除了初等教育師資的培訓之外，尚包括產業、低階官吏等殖民地統治所需的現代人才之培育。而這批人從 1920 年代以後，更成為殖民政府推動的「青年團」政策中最重要的推手。此點亦可從作者書中所提新莊街地方指導者與青年團核心人物的學經歷當中直接獲得印證。例如，在新莊街半世紀的教化團體與青年團體當中，作者所列舉出的關鍵性人物，包括徐耀棠（1932 年新莊弘德會會長）、鄭福仁（1926 年新莊青年會長、1935-1944 年新莊街助役）、吳培標（1930 年山腳青年會長）、李國祥（1920 年新莊街協議會員）、謝文程（新莊街協議會員、臺灣民報社新莊郡駐在員；戰後任新莊鎮長、臺北縣長）、林大英（1933 年左右擔任青年團指導）等所謂臺灣人地方指導者，都是國語學校的畢業生。¹³ 而其中除了謝文程曾於 1920 年代直接參與抗日運動外，其餘都站在配合與推動殖民政府社會教化事務上。即使到戰爭時期，日本人全面控制街庄權力頂端，仍然需要這批臺灣人地方指導者之協助。而地方街庄青年團之指導，正是其主要任務之一。

換言之，作者雖鑑於以往青年團研究之成果多集中於討論 1920 年代之後，進一步往前追溯至 1910 年代，而將殖民政府青年團政策的始末鉅細靡遺地剖陳，

¹² 陳文松，《「校友」から「台湾青年」へ：台湾総督府国語学校《校友会雑誌》に見る「青年」像》，《年報 地域文化研究》9（2005 年），頁 138-163。

¹³ 宮崎聖子，《植民地期台湾における青年団と地域の変容》，頁 106、170-171、175、185。

同時亦認為青年團與學校教育之間是一種不即不離的關係；但另一方面，卻因僅從街庄這個限定的行政空間來看待公學校與青年團的相互關係，而忽略了其實扮演著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連結的「青年」，同時也是殖民政府與地方街庄間的「青年教化政策指導者」之國語學校畢業生，其實更早於 1910 年代即已扮演要角。這正可說明新莊街的青年團指導者何以大多為國語學校的畢業生，而且這種情形即使到 1942 年志願兵制度實施以後，地方街庄青年團的指導者仍多仰賴「國鬻」畢業生。因此，1896 年所設立的國語學校，在基於殖民政府的「青年」教育教化方針的形塑之下，一開始就是造成臺灣社會「分斷」的根源之一，而青年團指導者的養成很顯然是青年團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環，此無法單從街庄青年團運作或僅視為青年團內部權力更迭來理解，而必須從更廣義的「青年政策」來加以思考探究，並連結至其源頭。

其次，作者指出殖民政府在 1920 年代以獎助青年會等手段，來作為防堵抗日運動浪潮波及青年層思想惡化之防波堤；但是另一方面，對於青年會或青年團在此時期成為抗日青年團體，作為維護臺灣人自治與推動社會教育工作之掩體的可能性卻也不能輕忽。作者所舉之新莊街青年會（團），就相當有可能是這種情形。作者舉出新莊街由於從日治初期開始便有著武裝抗日運動之淵源，所以亦於 1926 年成為殖民政府補助的青年團體之一。¹⁴ 但是到了 1931 年，發生長年擔任新莊街教化團體領導人物的黃淵源街長（新莊街同風會會長，1923 年就任街長）突遭撤換的所謂「臺灣人街長更迭事件」，¹⁵ 主要理由是當局以黃淵源過度熱心於推動「漢文教育」。但這項撤換命令卻引起同風會旗下青年團核心分子的不滿，包括新莊街青年會長林世南與山腳青年會長吳培標等人遂發起街長連任請願運動，甚至不惜辭去街協議會員等公職以示決心。然而，最後仍不被臺北州知事所接受而改以日本人官吏（原新莊街郵便局長）充任，且此後直到日治末期新莊街長一職不再由臺灣人擔任。作者以此推斷殖民政府對青年團恐有遭臺灣人地方指導者導入成為抗日運動團體之隱憂並非空穴來風，故趁 1930 年青年團訓令發布後本欲強化對青年團之統制，遂以黃淵源「熱心漢文教育」為由去之以除後患，

¹⁴ 宮崎聖子，《植民地期台湾における青年団と地域の変容》，頁 93。

¹⁵ 宮崎聖子，《植民地期台湾における青年団と地域の変容》，頁 164。

作者並認為臺灣人地方指導者的抗爭乃是基於維護自我權位和利益，而更坐實當局撤換臺灣人街長之正當性。¹⁶ 殖民政府透過人事調整以強化街庄控制的目的並不讓人意外，然而其去職所引發的臺灣人抗爭事件卻不能僅將其窄化成維護個人權位與利益所為，反而更凸顯出即便是官方所認可扶助的教化或青年團體，雖無法明目張膽公開主張抗日，但卻依舊可一面附和當局政策，而一面以此為掩護其推動「漢文教育」與維護臺灣人街庄自治之兩面性。

再者，青年團是否真如作者所言，在臺灣地方社會扮演如此全面性之地位，而青年團的影響力是否確實如其人數所顯示的，那樣有效地深入臺灣社會當中，則尚有斟酌之餘地。特別在 1930 年代中期以後青年團人數的劇增，確如作者所指出乃與志願兵制度的實施有密不可分之關係。而對於臺灣青年來說，若缺乏此項決定性的變數，則青年團很可能始終是一個地方街庄少數人「打發時間」的聯誼性組織（作者口訪 1931 年加入新莊青年會的楊明坤所言）。¹⁷ 因此，即使在日後殖民政府利用青年團作為強制性軍事訓練和動員的組織後，作者引用新莊青年團員鄭志榮（青年學校畢業）的參戰經驗口述訪談時指出，鄭志榮欲藉由成為志願兵，「到了戰場上可與日本人平起平坐」，¹⁸ 表達一種臺灣人希望藉由從軍以掙脫「殖民統治差別待遇」的期待，說明戰爭時期何以臺灣青年紛紛「志願」加入軍隊的潛在理由。然而這更說明，這種期待顯然不是源自青年團的魅力，而在於志願兵制度或後來的徵兵制之實施。

此外，青年團誠如作者所言在不同階段扮演著不同角色，但是對臺灣社會來說，我們也不能忽略作者書中口述訪問中舉出，青年團指導者對於以「身體有病」為由企圖逃避志願兵的青年團員們給予痛毆的情形。¹⁹ 而隨著戰局惡化，臺灣社會青壯人力遭殖民政府大批徵調入伍，這些被徵調者雖未必與青年團有直接相關，但可以確定的是，這些青壯人力的被徵召，不僅讓農村勞動力益形缺乏，更讓青年團等教化訓練組織因缺乏指導者致淪為有名無實，²⁰ 1944 年初青年師範

¹⁶ 宮崎聖子，《植民地期台湾における青年団と地域の変容》，頁 171-172。

¹⁷ 宮崎聖子，《植民地期台湾における青年団と地域の変容》，頁 176。

¹⁸ 宮崎聖子，《植民地期台湾における青年団と地域の変容》，頁 342-343。

¹⁹ 宮崎聖子，《植民地期台湾における青年団と地域の変容》，頁 290。

²⁰ 鄭志榮訪談。參見宮崎聖子，《植民地期台湾における青年団と地域の変容》，頁 372。

學校便是為了解決指導者不足而匆促上路。然而諷刺的是，根據作家鍾肇政（彰化青年師範學校首屆也是最後一屆畢業生）之回憶指出，卻有不少臺灣青年乃是企圖透過進入上級學校——彰化青年師範學校以逃避兵役，且該校首屆招募的學生當中，更多是來自日本內地，同樣為了逃避徵兵而遠涉重洋而來的「インチキ学生（冒牌學生）」。

因此當我們強調青年團如何在戰爭時期，成功扮演著地方街庄青年層兵士轉運和培訓站，以及於不同時期造成作者所強調的臺灣社會分斷的同時，也不應忽視其在不同時期加諸於臺灣社會的沉重負荷與心靈煎熬，而且這些加諸於臺灣社會的重荷與煎熬有些或直接與青年團有關，但更多來自戰爭的全面動員。

最後，筆者雖然在前述當中突出國語學校畢業生所扮演的角色，特別是在1920年代以後。然而，這並非為了證明殖民政府「青年」教化政策的高瞻遠矚，而毋寧是更證明殖民政府對臺灣這塊殖民地的「應付」心態和「以拖待變」的政策施為。「青年」政策如此（恕在此無法深論），本書所析論之臺灣「青年團政策」的演變，同樣令人有亦復如是之感。鑑於現代國民國家之成立，首要之務乃在於現代國民之養成，而欲成為一現代國家之「國民」，則必須擔負受教育、服兵役和納稅之三大義務。其中又以青年國民之培育，更是現代國家發展初期的急務。而自日本以現代帝國之姿取得殖民地臺灣後，納稅與受教育（非義務教育）在統治之初便先後加諸賦予「新附之民」，唯獨服兵役之義務其後雖曾遭議論卻又屢被擱置，加上中等以上學校教育的質與量嚴重被限制，造成臺灣青年層大量成為社會上的「遊民」，成為日後社會青年教化團體——青年團（有條件）收容的對象。而在日本敗戰前夕殖民政府終於宣布在臺灣實施徵兵制，讓臺灣青年得以取得「服兵役義務」而符合成為現代國民資格的第三項要件，俾確保兵源之補充和收服人心。姑且不論臺灣人是否願意成為日本人，但在法制上隨著徵兵制的頒布實施，象徵著臺灣人成為「日本人（皇國民）」的最後一道門檻，已因戰局的需要而被卸除。然而徵兵制仍因日本敗戰宣布投降彷彿曇花一現，這樣的結果不管幸或不幸，卻已將青年團的軍事性格曝露無遺。換句話說，青年團與殖民地臺灣軍事動員體系的建立與否，早從殖民統治中期便已浮現，然而礙於殖民政府欲維護在臺日本人權益以及不信任臺灣人的「政治」情況下，軍事訓練實施時程一直

被推遲或排除。無奈到了末期終迫於局勢，各種與青年相關的社會教化、軍事訓練設施紛紛匆促上路，卻因手法既拙劣又無定性，結果不僅造成臺灣社會世代間的分斷，也讓日本人與臺灣人之間的民族龜裂與其殖民統治相始終。此從本書歸納出殖民政府青年團政策之變遷看似按部就班，但自 1930 年至 1945 年的短短十五年內卻可區分成四個時期，而前面的二十年間只分成兩期來看，更說明青年團政策的轉折：前半段是應付臺灣社會的要求被逼出來的，而後半段則是因應戰局演變所匆促推出來的急就章。

至於本書在史料運用上，作者以人類學田野調查方式訪問許多原新莊街青年團關係者的耆老口述史料，不僅內容豐富且具關鍵性。相較於以往青年團或教化團體研究，往往過度偏重官方史料的情形，實為本書的一大特色。即使如此，作者對於官方史料的蒐集亦不偏廢，不僅鉅細靡遺（此可從本書幾近四分之一篇幅的〈資料篇〉可見一斑），且與口述史料來進行不同史料間的「歷史對話」。不過，作者對於臺灣 2000 年以來出版有關地方街庄行政的相關日記，卻完全未見參酌，殊為可惜。其中如張麗俊著《水竹居主人日記（1906-1937）》（2000）和林獻堂著《灌園先生日記（1927-）》（2000-），張麗俊與林獻堂雖皆屬中部地區出身的地方領導人物，但對於了解日治時期臺灣地方街庄行政運作與青年教化、軍事動員等相關重大政策對臺灣社會之影響與領導階層之應對相當有助益，作者日後當可進行更深入的分析與對照。

總之，作者在本書中對於青年團組織進行長時期的追蹤與重建，讓讀者能對於殖民統治時期臺灣的青年團演變，如何從一個「社會教化裝置」，隨著時代不同而轉變成為「抗日運動的防波堤」、「地方指導者培養所」，到最後成為戰爭動員時期的「士兵培育訓練裝置」的歷史過程，層次分明脈絡明晰，不管從法令上與實證上，都能環環相扣。特別在 1939 年到 1945 年日本敗戰之間青年團體的劇烈變動期，作者更以整整兩章的篇幅加以梳理剖析，其毅力與耐心更令人折服。雖然作者因偏重「青年團政策」而忽略與整體「青年政策」之聯繫，但這只是筆者個人主觀偏頗之見，絲毫無損本書的價值。

引用書目

王世慶

- 1991 〈皇民化運動前的臺灣社會生活改善運動：以海山地區為例（1914-1937）〉，《思與言》29(4): 5-63。

多仁照廣

- 2003 《青年の世紀》。東京：同成社。

吳文星

- 1992 《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正中書局。

周婉窈

- 2003 《海行兮的時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近藤正己

- 1996 《総力戦と台湾：日本植民地崩壊の研究》。東京：刀水書房。

柳書琴

- 2007 〈傳統文人及其衍生世代：臺灣漢文通俗文藝的發展與延異（1930-1941）〉，《臺灣史研究》14(2): 41-88。

若林正丈

- 2001 《台湾抗日運動史研究・増補版》。東京：研文出版。

宮崎聖子

- 2004 〈植民地期台湾における青年団の研究（1910-1945）〉。東京：お茶の水大学人間文化研究科博士論文。

- 2008 《植民地期台湾における青年団と地域の変容》。東京：御茶の水書房。

陳文松

- 2005 《「校友」から「台湾青年」へ：台湾総督府国語学校《校友会雑誌》に見る「青年」像》、《年報 地域文化研究》9: 138-163。

蔡慧玉

- 1996 〈日治臺灣街庄行政（1920-1945）的編制與運作：街庄行政相關名詞之探討〉，《臺灣史研究》3(2): 92-140。

蕭阿勤

- 2008 《回歸現實：臺灣一九七〇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